

蒋介石研究专辑

(一)

宁波师范学院政史系

蒋介石研究室编

目 录

蒋介石综论	杨树标 (1)
蒋介石与溪口	曹屯裕 (32)
蒋介石与孙中山	虞宝棠 (82)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姚守中 (110)
蒋介石与新军阀混战	刘其奎 (146)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余子道 (200)

历史知识出版社

室 宝 形 子 介 蒋

101年8881

蒋介石综论

杭州大学 杨树标

研究民国史、党史、现代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1987年2月—7月《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里有这样三句话：“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所以我想，在民国史、党史、现代史、革命史等这些敏感性很强的学术领域的研究中，最主要的还是“左”的问题，思想上还受到限制，首先要排除“左”的干扰，才能有所突破。

今天想谈四个问题。一是关于蒋介石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目的和任务问题；二是关于蒋介石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的方法问题；三是关于蒋介石研究所遇到的几个具体问题；四是如何开展这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几个建议。

在谈这四个问题之前，我先讲讲目前在教学研究中碰到的十二个问题：

（一）组建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从1912年建立中国国民党到1914年重建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我过去是否定的多，当时下了三个结论：①它的建立处

在党派纷争的过程中，而它自己本身又是几个党派的凑合；②它不知道怎么从事干革命，不知道从民众当中来到民众当中去，而是依靠议会，依靠少数军阀；③它是为了当时革命而建立的。这样评论正确与否，我对自己的讲法产生了怀疑。现在看来，中国国民党尤其是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应该说是作了很多准备的。它的纲领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的纲领，而且它规定得也相当细致，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所以怎么重新评论这段历史我自己感到也有怀疑。

（二）孙中山为什么要同中国共产党搞国共合作？

这个问题说到现在还未说清楚。过去我的观点认为孙中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同共产党合作的。按照何干之的观点，就是孙中山那时候搞“联甲到乙”法，即联这派军阀来搞到那派军阀，倒来倒去，最后走投无路了，遇到了十月革命，遇到了五四运动，遇到了中共的建立，就同中共建立起合作关系。我认为这里最主要的是孙中山同共产党合作，是把两党放在平等基础上，还是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派别或小党加以吸收？这个问题还未搞清楚，有待研究。

（三）北伐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以前我们认为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工农群众运动。工农群众运动是否能把北洋军阀搞倒，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象工人罢工、农民运动、戴高帽子游街是否在当时起很大作用？实际上我们当时“左”的情况比较厉害，譬如戴高帽子游街，这一项就做得过火。因为在当时能够当上军官的，家里大都是小资本家，小地主或者土豪劣绅。这些军官在前线打仗，而在后方却把他们的老子揪出来游街，这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情绪，有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叛变的。当时北洋军阀比较强大，他们有真枪实弹，单单靠工人群众运

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把他们搞倒。而当时又没有象我们抗日战争时那样有两个战场，这时只有一个战场，你总不能讲有一个是工农革命群众的战场，一个是前线战场。过去我们讲北伐战争，只说叶挺的“铁军”，这在研究中是欠缺的。北伐胜利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在过去教学研究中没有讲清楚。中央电大的讲稿在讲北伐胜利原因时有一条指出，制订了一个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但谁制订的却没有说明，即没有主语。总之，北伐胜利的原因还有待于我们研究。

（四）北伐时期我们“左”的错误是什么？

以前我们总认为那个时期的主要错误在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事实上我们那时“左”得很厉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来“左”的情绪很厉害。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讲到武汉时期剪旗袍，弄得人往小弄堂里钻，而童子军到处把关，这些童子军就是红卫兵。所以我觉得北伐时期，大革命时期，我们“左”的错误应该研究。我又想，人家叛变革命，有的是我们逼的，逼得他只好走那条路。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

（五）对新军阀混战的评论。

这个问题同我们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有关系。按我们的思路，最好他们天天打混战，因为新军阀混战给我们根据地以发展的机会，他们一打起来，就无暇顾及我们了。不打，我们就麻烦了。这样在教学中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讲不清楚。到底新军阀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于我们发展；不打，即算统一了，我们又讲它不好。所以对新军阀混战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问题，过去没有讲清楚。

（六）我们的土地政策问题。

实际上我们的土地政策一直到公社化可以讲基本上是农

民革命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太平天国那一套，天朝田亩制那一套，结果都失败了，也就是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中国农民富起来的问题，这条路子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摸索过程中。这就涉及到我们过去教学中对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闽西党的“一大”、“二·七”批斗会议、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都欣赏得不得了，似乎只有我们才找到了解决中国农村根本问题的路子。实际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农民的那种平均主义思想到底是怎样？列宁的那套合作制思想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也值得研究。

（七）反“围剿”的问题。

过去说法认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正确领导，所以打赢了，第四次虽然毛泽东受到排挤，但因朱德、周恩来还按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所以打赢了。第五次彻底不让他们搞了，所以失败了。假设第五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的，那么会怎么样呢？按我们的逻辑，应该打赢。但我认为也是要失败的，只是没有输得那么惨，只不过可能拖延一点时间，但失败是绝对的。有人会提出，你这是博古的观点，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报告的那个观点：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敌强我弱。事实上第五次“围剿”与前面几次在各个方面确实很不一样。过去我们确实夸大了毛泽东的作用，夸大了敌军“围剿”的兵力，如第一次“围剿”在第一线的实际兵力不过三、四万人。

（八）“攘外安内”的问题。

以前讲得比较直接单纯。这句话本身若撇开许多历史环境和条件，无疑是正确的。内部不安定团结怎么能够“攘外”呢？而且这句话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的，不是蒋介石的

发明创造。蒋介石在庐山训练时说：总理说过，攘外必须以安内始，而且安内包括范围不仅是反共，也包括对其它军阀的问题，其中很大分量是对其它军阀的问题。他把主要精力转到对付共产党也有一个过程。因为蒋介石内部始终是不安定的，前面两次下台就能说明问题。反蒋派的力量很强，活动的时间也很长，直到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反蒋活动一直是比较激烈的，所以他的安内很大成分是如何安定内部各派军阀和各个政治派别的问题。在政治上，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等势力也都很强。所以过去教学中有这么个偏向，即只要是反蒋，无论是谁，总是不错的，而且感情上还都对他们比较友好。实际上他们反蒋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自己，他们也不是好东西。若把蒋介石换成冯玉祥，这个国家也不见得会好，而且会更乱，冯玉祥远远不如蒋介石，他也根本治理不了。

（九）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的变化。

关于蒋介石在这个时期的变化我们没有讲清楚。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在变，他逐渐把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那么到西安事变，停止反共，共同抗日，那就来得比较自然了。而我们在教学中，常讲那时蒋介石坚持“攘外须先安内”，始终把反共放在第一位，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原始资料说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假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始终坚持反共第一，那就很难理解我党的方针，那就显得王明的政策完全正确了，而毛泽东这一套却变成右倾投降主义了。因为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我们如始终把蒋介石当作主要敌人来打，这就是“左”。所以我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如蒋介石那一套没变，而我们这一套变了，那么这

是右倾机会主义；如蒋介石那套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那么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事实上是天变道也变，蒋介石在变，我党的方针、政策也在变，两者是会合拍的。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十）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如何真正地估计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难度很大，这里还涉及到美国援助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助以及太平洋战场的开辟，对中国抗日战争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有些搞世界史的同志认为，从抗战胜利的外因来讲，最核心的是美国的援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牵制了日本的力量，尤其是瓜岛战役后，到1944年打入日本绝对国防圈，这时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的骨干力量，基本上已撤完了。8月2日，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在长崎、广岛丢原子弹，那都是政治战，不是军事战。

（十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什么急于发动内战？

蒋介石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败得如此惨，如此快，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在打“消耗战”，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么回过头来看，他在抗战胜利后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发动内战，到底他有几分把握？这个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十二）台湾四十年问题

蒋介石到台湾后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实际上台湾这段历史同大陆有密切关系，因为他到了台湾以后，总结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台湾经济有所发展。现在南京大学茅家琦先生主编了一本《台湾三十年》，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社科院的胡绩伟先生原在台北大学工作，他对台湾问题也很有研究。

现在开始讲第一个问题，即关于蒋介石历史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的目的是任务。

目的有三条：

（一）可以这样讲：不了解蒋介石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革命史。

马齐彬有这样一个观点：不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广东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认为，蒋介石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军事家，假如谈不上伟大，那么至少可说是“出色”、“了不起”的资产阶级军事家。要是蒋介石是反革命流氓，那么共产党对付了他二十二年，这又如何解释呢。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不能讲他是草包、流氓。

（二）为了完整准确地了解我们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使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历史了解得有血有肉。

天变道也得变，蒋变我不变或蒋不变我变，都是不合拍的，这里面有它的一致性，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很正确了。

（三）通过这一领域的教学研究，使我们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虚的，而是通过具体史实来进行论证的。蒋介石的一生是反动的，这不可否认，但蒋介石的一生也是有功的。功在两个方面：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蒋介石这个人物。根据蒋介石的发展变化，我们可把他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也不是一律肯定或一律否定。这里有一个基本方面，在基本方面之下有的是否定之中有肯定，有的是肯定之中有否定。①在辛亥革命时期，总体上应该肯定的，但杀陶成章是错的。②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比较复杂，我的观点是前期、中期

基本肯定，后期基本否定。问题是前期、中期与后期怎么划分？我把蒋介石在1927年3月占领上海作为中期、后期的划分线。③南京十年阶段，即1927年到1936年，应该基本否定。但“第二次北伐”不能否定。若否定，那就不但不要打垮吴佩孚残余部队和张作霖，而且也不必东北易帜了。“编遣会议”也不能完全否定。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这里有些事也应肯定。④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基本肯定。蒋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坚持抗日，没有投降日本，没有当汪精卫，而且打了不少漂亮仗，这些应该肯定。这里要否定的是他的反共，但三次反共高潮的概念是否正确，值得讨论。⑤新内战时期，应该完全否定。

一、根据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研究蒋介石历史的任务有以下几点：

（一）从历史学本身来看，应当把蒋介石的一生搞清楚，应该对他的一生树立起“变动”的思想。

（二）要搞清楚三民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又有不同的牌号，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戴季陶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叶青的三民主义、台湾的三民主义等等。

（三）搞清楚蒋介石同国民党组织的关系。蒋同国民党不能划等号，两者的关系有分有合。

（四）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一国两制和统一大业。

① 下面讲第二个大问题，即关于蒋介石历史问题教学与研究的方法。

（一）首先是处理好史与论的关系。史论关系问题，即

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我就不展开了。

（二）着重讲讲关于研究的资料问题，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些资料。

大陆解放后出版的资料中，比较大型的一种是《文史资料》，其中有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的回忆录，有些很有史料价值。比如王耀武写的围追堵截方志敏部队的那一篇，就写得比较真实。当然有些文史资料有待考证，如宋希濂在文史资料和他自己所写的《鹰犬将军》一书中，都讲到1948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但在蒋自己的材料上会议要到8月3日才开始。第二种比较大的是《民国史资料》，它包括一些档案资料，很有用处。现出版了许多围绕着《民国史资料》的专辑性资料，如前一时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就把战时国民党的有关文件、电报都汇集起来了。又如《民国档案》杂志里，有的史料很宝贵。如胡汉民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的七次会议纪要对于我们研究“非常会议”、“和平会议”以及蒋介石第二次下台都很有用处。

另一类是解放前出版的。比较权威的有毛思诚写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再有如《蒋介石自反录》，都是较权威的。还有好多训练集，如《黄埔训练》、《东征训练》、《庐山训练》、《峨嵋训练》等都较完整。

再一类就是港台书籍。目前大陆引进的最大一套是《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1500万字。此书帮我搞清了很多疑问。若要把教学研究真正搞下去，这套书是必备的。当然有些有改动，但大致不差。此书共分七大类，最大类是演讲集，其中收录在大陆演讲942个，在台湾演讲407个。家信、电报也编得较全。我答应给他们编的《四十岁前

的蒋经国先生》共分三部分材料。第一部分是1925年前的蒋经国，主要采用了蒋介石写给蒋经国的21封家书，中心思想是要他儿子好好念书，其中特别谈到最要紧的是数学、国文、英语三门课，讲到当今世界不懂外语就等于是一个瞎子，一个哑巴。这21封信就选自这部资料，我还对照了好几种其他资料，说明它还是可靠的。第二部分是蒋经国的日记，他在苏联13年，每年选一篇，大约四万多字。第三部分是苏联回来以后，有建设新赣南、搞三青团、东北特派员、上海打老虎这几方面材料。这本资料可望明年蒋经国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台湾的传记很多，但可用的材料确实不多，包括黎东方的《蒋介石全传》、《蒋介石续传》、李敖写的3卷本的《蒋介石研究》。第二套较大的书是15卷本的《蒋总统秘录》。它的最大价值是第一次公布了蒋介石这么多的日记。我认为这些日记是比较可信的，越到后来越感到真实。尤其解放战争时期，把他那种失败的情绪，那种垂死挣扎的情绪都表露出来了。港台出的书很多，但比较完整、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蒋总统秘录》这两套书。

我们自己已出版的有中华书局1962年出的《蒋介石言论》（1912年—1927年）。此书把蒋在这个时期的文章、言论、书信、报告都放在一道，但未公开发行。我写的孙中山与蒋介石所用材料基本上来自此书。美国人霍塞写的《出卖的上海滩》60年代我们出版过。最近香港要出一本《从名记者到幕僚长》，主要是根据陈布雷回忆录第一、二集编写的。陈布雷回忆录写到1939年止，是根据陈的手迹印行的，他的字很漂亮，材料也十分丰富，39年前有关重大事件都有记录，包括第二次北伐、新军阀混战，包括九·一八事变，一直到两广六·一事变、西安事变、七·七芦沟桥事

变，直至武汉失守。还有一本是上海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讲蒋介石上台时期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公布了50件往来书信、电报，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我写蒋介石上台写到他同上海江浙财团的关系，权威的材料就是抄它的。我把传统的、包括日本的想法全部推翻了。到底江浙资本家给了他多少钱，谁都没有讲清楚，这本书把它讲清楚了。算一下共有七次，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江浙资本家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情况，再一本就是《陈英士先生年谱》，它是胡宗晓编的，是解放前出版的，我写蒋与陈的关系，其中一个主要的依据是这本书。这本书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有，很有价值，把辛亥革命时期陈与蒋的关系基本上讲清楚了。而且也为陈作了平反。再另外一本是何干之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这是何的最后一本遗书，我就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教益和启示的。1961年我开始搞“蒋介石”这个题目，就是给他当助手的。因为当时他接受了陈毅同志交给他的任务，叫他写一本《蒋介石传》，当时我们几个人就给他当助手，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太刺耳了，因为这样就要树碑立传了。就改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后来何于69年去世了，由他夫人刘炼重新加以整理，根据当时我们记下的卡片，根据当时另一位参加的同志的卡片加以整理出版。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些“左”的观点，这是难免的，就是革命性比较强一点。再一个是台湾出版的《北伐战史》，共5卷，这本书很好，它把北伐时期的，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东征、到第一次北伐、到第二次北伐，有关的资料都编进去了，我想假如我们搞北伐战争史，不仔细研究这套书，写出的北伐史肯定是不行的。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时亲手下的手令、电报、布告

共61件，这套书都收录了，资料很完整。再一本是苏联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讲到了北伐战争时期包括苏联人对蒋介石的评论和一些过程。另一个是台湾出的《革命文献》，这一本书比较杂乱，前已出到70卷。这套书里有些东西参考起来还是很有用的，象编遣会就非常完整，再有关于清党时期的材料，四·一二政变的材料，也较完整。《李宗仁回忆录》这套书还比较客观，比其它回忆录写得好。按道理，李宗仁可以把许多污水泼到蒋介石身上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譬如说四·一二要杀共产党，他说是自己先提出来，他认为对共产党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来清党。还有一本台湾出的《江西苏维埃的建立及其崩溃》，讲到了五次“围剿”历史，我写军事“围剿”这部分采用了这里的好多材料。另外还有一套《关于军统和中统》的资料，是解放初期公安部编的，为了配合肃反与镇反，现在比较宝贵，是目前国内关于军统和中统的最完整资料。这里可以对沈醉的许多回忆加以怀疑，沈的许多回忆不可靠。浙江的两个军统头子同沈是一个级别的，对沈的回忆很反感，沈的回忆很多是死无对证。军统和中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现在我们在教学中很混乱，出了不少洋相。如有人讲史良才与杨杏佛是军统特务杀的。这就成了笑话。那时还没有军统，怎么会有军统特务呢？军统和中统就是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带来了一个历史大问题。我们的镇反条例上规定，凡是中统或军统特务，不管担任何种职务，有无罪恶活动，参加年限长短，一律定为历史反革命。但从史学研究角度来讲，这两个特务组织确实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它处于抗战时期，要搞大量日本情报，我们浙江40年到42年的站长顾老，他是上校，特赦出来的，他始终认为是冤枉，他说他当时的主要任

务是搞华北、汪伪政权的情报，不是搞共产党的情报。另一本是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我个人认为有一个缺陷，他反正是一骂到底，不及其余，他豁出去了，放开心思来骂，有些材料可参考。另外一套是《顾维钧回忆录》，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已出到第5卷，这里提供了大量关于外交方面有关蒋介石的材料，很有价值。陈公博的《苦笑录》份量不大，我写武汉时期的材料，这本书是主要的依据。为什么汪精卫要搞“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材料。讲到汪搞扩大会议也可作参考。浙江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出了3本。第一本把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这三个人关于八年抗战的回忆，放在一道了，共20几万字，第二、第三本把何应钦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的军事报告汇集拢来，对我们了解抗日战争很有作用，如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部队的序列变化，在这些资料里讲清楚了，我查到共有五次变化。还有一本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事变和陆军作战史》，是日本人写的，共5卷或6卷，把抗日战争有关日方的材料，加以公布，如花园口决堤，日本怎么评论这件事。再另外的就是《今井武夫回忆录》、《通敌内幕》，这两本书有助于了解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同日本人妥协的过程。这里顺便提一提陶德曼调停，1959年《近代史研究》把陶德曼、狄克逊来回的80几件电报翻译公布了，里面将怎么去做蒋介石的工作，蒋介石的工作做不通怎么汇报，这样一个过程讲清楚了，这里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是不屈服的，条件没谈下来。关于资料问题就讲这些。

（三）关于蒋介石历史教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蒋介石历史的教学研究应以蒋介石的历史为中心线索，旁及其他。在讲他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时，也应作客观的评

价。如我们讲到中原大战就容易偏到冯玉祥、李宗仁一边。蒋这个人物搞清楚了，国民党内其他的人和事就容易搞了，否则国民史研究就很难突破。总的意思是在教学研究中应以史料为基础，以蒋介石为线索，把其它问题带进去。

现在讲第三大题，即关于蒋介石研究中遇到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对蒋介石总的评论。

蒋介石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这点不应否定。前几年中央有个领导人讲过，蒋介石这个人是有功的，功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我觉得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比较完整的。周总理认为，蒋介石这个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战略家，一个凑合的资产阶级战略家。这是总理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评估的。（见《红色中国的札记》）我认为很正确。蒋这个人不光是一个武夫，一个一般的军人，他很有政治头脑，因为他出身于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说他流氓出身是胡扯蛋。他1918年就投奔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斗争，并非是交易所破产了才去投靠孙中山，而且1918年以前，主要时间也放在反袁斗争。从1918年一直到孙中山去世，他一直非常繁忙，主要精力是放在军事上。孙中山先生很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难得在何处呢？因为他既是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又是国民党内数一数二的军事家，是科班学出来的，儒家思想也很深，而且很有政治头脑。所以周总理说他之所以强于其他军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政治头脑。按我们现在的来讲，他善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两个关键的事例来看，一个就是对阎锡山按内部矛盾处理，对冯玉祥按敌我矛盾来处理，也就是说他对阎锡山采取缩编政策，

但保留他的建制，而对冯玉祥则采取彻底打烂的政策；再一个事例就是对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和对陈济棠、李济深、李宗仁的两广六一事变。对这个问题，他也按照不同性质矛盾处理，对闽变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坚决镇压，他自己坐镇建瓯，各路大军会合，海空配合；对两广六·一事变却又按照内部矛盾和平解决。所以说他很有政治头脑。周恩来同志对他的这种评价是很恰当的。那么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评价如何呢？四个字，就是“守经达变”，所谓“守经”，就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达变”，就是策略的灵活性。他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所以中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评价则是一骂到底，否定到底。因为当时是处在敌对的战争年代，我们要推翻蒋家王朝，所以毛泽东对蒋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下了五个全盘否定的结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对蒋这样一个人的评价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他在北伐时期的威望是很高的，无论是在军阀中间，还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2页上有一封信，此信是一个女子在1926年12月写给胡适的。信上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的英雄是胡适，武的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这表明，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的威望是很高的。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有变化。有人认为第五次“围剿”时，他的威望达到了最高峰，所以西安事变放出来后，许多地方召开了欢庆大会，迎接他的回来。到了台湾以后，问题就更复杂了，他治理台湾很勤俭，总结大陆的经验，所以到了75年死的时候，按照胡绩伟先生说，开始怕闹事，规定部长以上的人向遗体告别，结果来的人很多，要求公开出殡，台北市的老百姓跪在马路两旁。据说这次蒋经国逝世，个别部长以